

張詠梅： 副刊的「守門人」

「那時候，正是抗日戰爭結束後繼續三年內戰的時期，一群文化人集中在香港，等待『天亮』日子來臨。……在這期間，分別到過我的住處來的，除了周綱鳴先生，還有洪邁先生，夏衍先生，司馬文森夫婦，韓北屏，林林，陳殘雲夫婦，華嘉，黃蒙田；而最多來往的是黃谷柳，胡明樹和柳木下，因為他們都是住在九龍城地區，同我的距離最近。（侶倫〈惆悵的追憶〉）」

張詠梅，2011「副刊的『守門人』——從《華僑日報·文藝》(1947.2.23-1954.11.9) 作品看副刊主編的角色」，載於梁秉鈞、陳智德、鄭政恒(編)，《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25-27頁)，香港：匯智出版。

* * * * *

副刊主編的文壇關係網絡

在1947至1950年間，不少因國共內戰而南來的左翼文化人在這個副刊上發表作品，如司馬文森、胡明樹、黃谷柳、樓棲等。侶倫在〈藝壇俯拾錄〉(三十八則)中提到：「解放戰爭初期，國內大批文化人湧到香港，他們有部分人都向《文藝週刊》投稿。經常在那裏發表文章的作家，有黃谷柳、司馬文森、胡明樹、柳木下、華嘉、鍾敬文等。」¹另外又在〈四十年代的光與暗〉中提到「國內戰爭又打起來了。漫天風雨待黎明，國內的進步文化人又從四方八面來到香港，……《華僑日報》的〈文藝週刊〉……都是他們發表文章的地方。」²從四〇年代末期的《華僑日報·文藝》來看，侶倫的憶述基本上是準確的。

四〇年代末期南來文人大多不滿國民黨而傾向左翼，左翼思潮成為當時香港文壇的主流。鄭樹森談到「文學界在四十年代後期幾乎變成政論界，對政治的興趣、介入似遠比創作還大。由此可理解四十年代後期文學的政治化、左翼化及政策化。」³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下，侶倫無可避免會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此外，他與當時留港的左翼文化人時相往還，在〈惆悵的追憶〉中憶述當時與他們交往的情況：

「那時候，正是抗日戰爭結束後繼續三年內戰的時期，一群文化人集中在香港，等待『天亮』日子來臨。……在這期間，分別到過我的住處來的，除了周綱鳴先生，還有洪迺先生，夏衍先生，司馬文森夫婦，韓北屏，林林，陳殘雲夫婦，華嘉，黃蒙田；而最多來往的是黃谷柳，胡明樹和柳木下，因為他們都是住在九龍城地區，同我的距離最近。」⁴

這群文化人包括南來的左翼作者，還有本地文藝青年，由於彼此的友誼，他們自然成為《華僑日報·文藝》初期的基本作者群。

但是，從資料上印證，筆者想補充當時《華僑日報·文藝》的作者群除了左翼南來文化人以外，尚有編者侶倫、本地作者葉苗秀、雅谷、琳清、黎明起等，兩者並存於《華僑日報·文藝》的版面上。侶倫也沒有提到1950年後作者群的變化，當左翼文化人逐漸離開香港，他們的作品不再見於版面，較常見的多為本地作者葉苗秀、柳木下、雲林等，直至1954年11月9日停刊為止。

假如只看編者的說法，也許會得到《華僑日報·文藝》主要刊登左翼文化人作品的印象，證之於文獻資料，這只是《華僑日報·文藝》的其中一面，南來文化人與本地作者的作品，從一開始就並存於副刊之中，經過1950年的過渡階段，《華僑日報·文藝》的作家群基本上是編者侶倫及本地作者。在五〇年代初期，雖有不少右翼文化人來港，但侶倫並沒有選擇刊登他們的作品，除了因為主編的文壇人際關係以外，恐怕也與侶倫對他們的看法有關，他

在〈四十年代的光與暗〉中提到：「隨着解放戰爭的勝利，來自國內的文化人都先後回去以後，香港文壇很快又換上另一種局面。原來的一股熱辣辣的空氣給另一股低沉的冷流所代替。」侶倫在敘述過程中表達了價值判斷，他用冷和熱的對比說明他對四〇年代末期到五〇年代初期香港文壇轉變的看法，基於主編的文壇人際關係及文學理念，自然沒有在《華僑日報・文藝》選刊右翼文化人的作品了。

註：此文章的註釋編號略為改動

¹ 侶倫：〈藝壇俯拾錄〉（三十八則），見《向水屋筆語》，頁 61。

² 侶倫：〈四十年代的光與暗〉，見《向水屋筆語》，頁 42。

³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國共內戰時期（1945-1949）香港文學資料三人談〉，見三人合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文學資料選（1945-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初版，頁 6。

⁴ 侶倫：〈惆悵的追憶〉，見《向水屋筆語》，頁 127。